我国网络文化发展的三种态势

□秦　汉

网络文化指网民在长期的网络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直接影响他们网络行为的心理因素。今年是我国接入互联网20周年，20年来，我国互联网在产品开发、品牌建设、营销推广、制度规范以及与国际接轨等方面均取得了飞跃式发展。与此同时，专属于互联网领域内的网络文化也在这20年中呈现出一些规律性的发展特征，而剖析网络文化的发展特征则要从网络传播的基本过程中去探寻，即由谁创造了网络文化，创造了什么样的网络文化以及如何传播网络文化。具体来讲，我国网络文化主要呈现出以下三种发展态势。



传播主体由精英文化向草根文化转变

在Web1.0时代，互联网内容的提供主要源自各大网站，是典型的单向型信息传播模式，信息发布者也就是社会精英牢牢把握着话语权，决定了受众接收的信息内容。例如新浪、网易、搜狐、腾讯等四大门户网站中的信息一般由网站编辑“把关”发布，网民与信息提供者以及网民之间很难产生互动。而到了Web2.0时代，随着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原创内容）模式的诞生，社会精英的网络话语权被大大削弱，普通用户，也就是草根，在接收信息的同时也可以上传信息，成为互联网内容的创造者，网络交互性得到显著提升，尤其是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的诞生，为草根主体主动发声提供了平台。以“7·23”甬温动车事故为例，普通民众借助微博的传播优势将无数细小声音聚合成奔腾激昂的巨大力量，步步逼近事件真相。事故发生4分钟后，乘客@袁小芫微博发布第一条消息，称动车紧急停车、停电并有两次强烈撞击。此条微博比新华社21点39分发布的第一条动车追尾事故的消息早一个多小时。事故发生13分钟后，乘客@羊圈圈羊发出第一条求助微博，转发量突破10万，2小时后该名网友获救。这种“所有人面向所有人”进行的不受限制的信息传播是草根文化的生动诠释。事实上，传播主体从社会精英向草根的换位，体现了人人平等这一人类社会的朴素理念，要让人人都可以发声，尊重社会底层的广泛民意。

传播主体的换位也意味着原有精英文化的解构与新兴草根文化的建构。具体来讲，草根主体会对精英主体所建构的网络文化进行对抗式的颠覆亦或是包容式的改良，以符合自身身份属性的特质以及所属群体的目标期待。就颠覆而言，草根主体参差不齐，崇尚个性与自我表达，反传统而标新立异，充满叛逆精神。网络的虚拟性、匿名性与互动性保证他们可以将日常生活的情绪宣泄出来或是将内心深处最质朴的想法诉说出来，建构出一套符合他们内心向往，与时尚潮流接轨的话语体系。微博上发出的“杜甫很忙”恶搞涂鸦插图，使成名1200多年前的“诗圣”杜甫一下子又成为“微博红人”，用网友的话说，“子美真是个居家好男人”。其实，孔子、李白、辛弃疾、韩愈等文化名人也没能逃过恶搞涂鸦的“劫难”，这股风潮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争议。关于改良，草根主体不等于“破坏主体”，他们有着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切感悟，纵然愤世嫉俗，但原因在于现实状况与心中梦想相距甚远，他们希望通过“草根”的方式来助推现实的变革，可以说是在理性包容基础上的诉求表达。

除了技术上的推动外，更为重要的是包含着最广泛的基层民众这一庞大群体的诉求与希冀。

传播内容呈现主流文化逐渐与亚文化共容的景象

一直以来，我国的媒介话语体系是以宣传具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伦理、道德、法制与秩序为主，也就是社会主流文化，它强调公民的归属感与责任感，为社会绝大多数人认可与支持，并以此约束和指引公民的社会行为。但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网络上，主流文化常常以灌输、宣传的方式，生硬地呈现给民众，因此，主流文化的传播有效性比较低，尤其是对于青年一代。而另外，年轻一代是网络参与的主体，由年轻网民在网络实践过程中所逐渐积淀下来的非主流文化，俗称亚文化，迅速抢占了整个网络舆论场，并扩散至现实领域。事实上，亚文化是与主流文化相对应的文化现象，由于其直接作用或影响人们生存的社会心理环境，影响力往往比主流文化更大，也能赋予人可以辨别身份属性的特殊精神风貌和气质。在互联网时代，“屌丝”这一网络语言就是一种具有夸张与扭曲特征的网络亚文化。自称“屌丝”的青年网民往往以各方面存在明显优势的“高帅富”群体为参照，常使用“穷、丑、矮、矬”来描绘自己。在他们眼中，爱情上是“女神的备胎”，生活中是“奴才命”，未来发展会“永无翻身之日”。应该说，“屌丝”是青年网民寻求建构其独立语言部落与社会角色认同的一种个性化网络语言。

亚文化的出现从宏观上来讲是因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多年实践，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塑造了具有强烈主观意愿，敢于“我型我塑”的新一代，微观上则是因为网络的虚拟空间为他们提供了实现心灵释放的场域，并且越是另类就越能引来他人的围观，从而满足“聚光灯下的骄傲”，实现个性的张扬。

需要强调的是，除了淫秽色情、血腥暴力、封建迷信以及其他违反法律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亚文化，本质上，网络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只是文化的不同表现形式。人们应该以尊重文明多样性的态度客观看待这一新型文化形式。何况，网络亚文化具备生动活泼、灵活多样的显著特征，传播效果远胜于主流文化，也更容易打动年轻人的心。其实，主流文化和亚文化应该在互联网上和谐共存、共生共容。亚文化是网民的主动创造，主流文化是维持社会良性运行的有效保障，二者的和谐共处实际上是社会稳定性与社会活力性的有机统一。而且，网络亚文化的表达方式对于改进主流文化传播，提高其传播有效性大有助益。例如“最美妈妈”吴菊萍、“最美女教师”张丽莉、“最美司机”吴斌，这一连串“最美”都是网络传递主流文化的典型。主流文化本不过时，但主流文化的表现形式的确不能使人满意，借用好网络亚文化的有效表达方式来提高主流文化的传播效果，不仅有助于现阶段网络及整个社会的有序运转，更重要的在于未来。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亚文化而没有主流文化，那无论是网络的虚拟社会还是现实的社会实体都将是没有精神寄托，没有力量源泉的，终究不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传播主体的草根化一定程度上会带动传播内容的亚文化，而草根化与亚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传播渠道的多样化。

多元传播渠道带来由个体文化向圈子文化的跨越

个体文化，顾名思义，就是网民个体在网络上的自我行为文化，虚拟性强而互动性低，网络活动主要以浏览网页为主。而随着论坛、群组、豆瓣、微信等新媒体的诞生，网络文化出现了由单独个体文化向以熟人社会为特征的圈子文化的转型。

个体文化向圈子文化跨越的主要原因有：首先，出于对现实生活的需要。依据六度分割理论（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圈子中的人们更容易与他人联系，实现快速交友，从而形成“物以类聚”的生态形式，使各种虚拟社区越来越像真实生活中的人际圈。例如豆瓣网，它的小众聚合是以文化产品的评论内容为载体，将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们聚集起来，让他们建立起自我展示的平台，提供给他们挖掘、管理、记录个人兴趣爱好的空间。这有助于提高用户之间的情感忠诚度，打破彼此间心理隔阂。其次，圈子文化的真实性与准确性符合网民的心理期待。正是因为圈子文化的典型特征是熟人社会，所以圈子中的信息会更加可靠，不仅是因为它会经过圈子中的其他人的筛查与过滤，而且在熟人社会中欺骗所需要付出的高成本也会大大降低虚假信息出现的概率。在美国，由54位社区居民于2011年10月联合创建的网站“邻里之间”就是一个真实的信息交流平台。真实的信息与便捷的互动方式能够增进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与交流，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共同创造一个友好、安全的生活环境，例如寻找失踪小狗，推荐餐馆、医院、保姆等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站解决，俨然就是一个社区网络圈子。不论在何时何处，人们都能彼此分享，共同工作，或是发起某种公共行动，这就是“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另外，圈子中的信息也会更具针对性，在帮助网民提高信息搜索效率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海量化与碎片化信息带给他们的烦躁。仍以豆瓣网为例，用户不仅可以随时记录读书心得、观影体验以及各种评论，而且所有内容的分类、筛选、排序都由用户自己决定，同时，用户可以看到他人的推荐，网站也会运用相关数据分析进行推荐，以最大限度发挥网站的内容聚合能力。最后，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圈子文化符合人的社会性本质。网络之中各式各样的圈子为网民提供了虚拟世界中的真实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网民会摘掉“面具”，敢于吐露心声，主动交流讨论，获得安全感、责任感与归属感，并且在此基础上，圈子中的网民之间会建立起强大的纽带，彼此之间更加信任，而整个圈子也会更加稳定。实际上，许多生活中的圈子会移植到网络中，如班级的微信群，同一工作单位或是来自同乡的农民工的QQ群。这类圈子就具备鲜明的稳定性。

社会化媒体对圈子文化形成的意义不仅在于消除了地理隔离，降低了沟通成本，更重要的是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分享的平台。此外，原子化的都市生活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社会关系逐渐被割裂，而社会化媒体建构的虚拟社区可以让人们将孤立、零散的时间有效利用，整合成为丰厚的社会资产。维基百科的成长见证了这样的奇迹——普通人利用碎片化时间创造出一部真正的电子百科全书。为维基贡献过脑力和体力的人们被称为“维基作者”，是穿越时空的智慧共同体。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说，我们正处于一个“沙皇退位、个人抬头，消解中心主义”的时代。一个一个网络趣缘群体就成为了网络的鲜明特色。

通过对三种发展态势的分析，可以说，草根文化与亚文化是圈子文化的具体表现，而圈子文化是草根文化与亚文化的重要保障，它会对二者的勃兴起到助推作用。

总体来讲，从网络文化发展的三个态势可以看出，技术手段的革新对于网络文化的革新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网络文化的形成主要还是在于网民的网络实践。网民的网络实践是一种自发行为，是内心诉求的真实写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因此，对于网络文化的未来发展，只要在不违背国家法律与人类伦理道德的前提下，我们就应该善待网络文化、善用网络文化、善管网络文化，积极营造有利于网络文化发展的良好氛围，提供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促进网络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因为对网络文化的尊重就是对网民的尊重，对网民行为的尊重，对社情民意的尊重。

文化视野

技术、人性与文化传承

□郭秀丽

人类在生产生活中，会积累很多知识和经验，借以传承后代，使他们少走弯路，获得易行有效的生产生活方式，合理地规避自然及疾病的侵害，更好地顺应自然、利用自然，达到健康平安的目的。如，“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天上鱼鳞斑，晒谷不用翻”，揭示了天象和天气变化之间的客观联系，有预报天气的作用。“一九一九有风，一伏一伏有雨”，揭示了冬夏风雨时象的联系，能启发人们从冬天数九节令风的变化判断来年夏天数伏节令雨的变化，是千百年来人们在农事活动中总结出的规律。“立夏起土尘，四十天刮黄风”，揭示了节气和风象之间的客观联系。“小儿积食，鬓角发热”，提示父母如何观察孩子身体状况以预防疾病的发生。诸如此类的谚语、顺口溜在过去生产技术和医疗水平较低的年代，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智慧的结晶。在技术不那么发达的年代，这些文化所起的作用也是其他东西无法替代的。

但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由人与自然原始沟通得来的经验和知识的使用空间逐渐被更为便捷的技术挤压。比如，有了从各种媒介都能获取的天气预报，人们就不再关心并传播祖辈口耳相传的相关农谚、俗语，也不会按照这些去观察云彩观察天象从而判断天气变化了；有了温度计等各种医疗器械，父母也不用凭着祖辈流传下来的经验判断孩子的身体状况了。去繁就简，人类本性使然，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单纯依赖技术获取间接信息，就会失却与自然万物直接沟通交流的机会，人的精神生活势必发生异化。正如赵汀阳在《文化为什么成了个问题》中所指出的，“现在往往只以生活和社会的‘技术水平’定义生活质量，这一点即使不是可疑的，也至少是片面的”，“‘技术’却按照科学的可能性去创造精致食物，它虽然并不能重新定义人性，但却试图通过重新定义人性而歪曲人性”。从这一角度来看，实用主义思维在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时代，给人类的文化传承和精神生活带来了难以避免的戕害。

试想，如果一位父亲在眺望远山或仰望天空时，对孩子说，远山看起来比平时近很多，说明未来几天要变天了；天空出现了状如拉丝飞絮的云彩，未来几天或多或少要有雨下来。而当这些话语被印证为实的时候，孩子的心里会升腾起怎样的感受。这种无间隙的时空交流，这种无障碍的文化传承，使得人与自然如同朋友一般有了对话，让人不由得对大自然的灵性生起敬畏仰慕之心，也会因为自己能在传统文化的指引下读懂大自然感到自豪。如果一位母亲在孩子不慎着凉咳嗽初起时，就能用双手搓热捂肺腧穴而使咳嗽缓解或停止时，孩子对能读懂自己身体的母亲会产生怎样的亲切之情。和现下孩子有一点小毛病就送他到医院的母亲相比，谁更能给孩子带来骄傲感和安全感就一目了然了。这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体验是别的任何先进的技术方式都无法激发的。这类情感是人类精神之源。可见，不管处于什么时代，不管技术发展到怎样的高度，都不能让技术完全隔离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交流，割断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偏重技术和物质的实用主义思维将会给我们的精神生活带来危害，我们要从精神和物质同样重要的角度改变和拓展固有的思维方式。

毋庸置疑，技术本是文化的产物，记载着人类文明的程度，能给人们带来物质的满足和精神的愉悦，诸多的积极作用数不胜数。人们生活在当下发达的信息社会，使用着无比先进的技术，也生产着新时代的文化，为文化的创新注入新的内容。但是，也应该充分认识到技术在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人的物化和异化以及价值伦理观念危机等方面的负面作用。如果无视这些技术弊端，不予以积极化解，人就会沦为技术的奴隶。如果只用实用主义思维考虑技术在当下的诸多可用和方便之处，而忽略曾经也起过实际作用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忽略这种文化的精神作用，就会陷入物质和技术主义的泥潭。本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实用而轻理想、重经验而轻学说、重现状而轻未来的思维一直延续着，人们的骨子里或多或少有着实用主义思维倾向。再加上近代以来，国外实用主义哲学传到中国，经国人改造后，成为通俗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反复强调有效性问题，主张以对主体的实用性为判断，进而发展成了一种急功近利甚而偏向追求物质效用的民族心态。在这种思维和心态之下，传统优秀文化中的精神效用很容易就被现代技术的物质效用取代，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遇到了思维障碍。

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传承，因为它是民族精神之源；技术发展脚步不会停止，这是客观规律。在偏重物质的实用主义思维之下，传统文化和现代技术之间的矛盾显得不可调和。这就需要改善思维方式，在注重技术物质效用的同时，关注传统优秀文化的精神效用。我们大可以运用传统的文化知识与大自然交流对话；在用越来越智能的体温计给孩子测体温的时候，也遵循老人叮嘱用嘴唇在孩子鬓角感受一下体温，既能帮助判断孩子的身体情况，也能传递亲情和温暖；在消费机器馒头的同时，也自己动手做做手工传统馒头，也学着做一做民间面人，享受原始的食材香味，享受民间文化带来的精神滋养。这样，物质和精神因素兼顾，使得我们在享受现代便利技术的同时，也获得精神享受。

文化新论

中国式乡愁

——关于《舌尖上的中国Ⅱ》

□张祖群

《舌尖上的中国Ⅱ·脚步》主要由8个典型的文化地理故事场景串联在一起：西藏林芝的小哥哥，为给弟弟攒学费，在大山深处挖掘药材，行踪不定，用树藤绕身爬40米高的大树徒手寻找并采集最大最为甘甜的野生蜂蜜；常年漂泊在外的养蜂人老谭，在川渝陕甘各个地方风餐露宿，在自己临时帐篷里，却能吃到妻子做的家乡一绝“乐山豆花饭”；陕西秦岭北麓蓝田县满脸皱纹的老奶奶，在灶膛上扯着风箱煮着一大锅裤带面；湖北西部房县大山中的孤独老人，在枯死的树木上摘取花菇，晾晒，烘烤，做成特殊香味的干花菇；山东沂蒙山区蒙阴县垛庄镇椿树沟姚芳英夫妇用白薯干、大豆、小麦、高粱、玉米等五谷杂粮碾成的粉，和鏊子、摊子、推子、油闸子等做成煎饼，包裹大葱、肥肉、豆瓣、咸菜等食物，煎饼入口回甘，但对人的咬合力绝对是个挑战；浙江台州海边一对打鱼夫妻为满足女儿的味蕾，父亲学了很多年才学会捕跳跳鱼、望潮的特殊本领，一家人常常在炖着海鲜的锅旁边举头望明月，对酒当歌，谈笑风生；贵州雷山乡下的小姑娘，盼望外出打工的父母回家割稻，一起做美味的酸鱼酱；曾经客居海外（在美国一个农场工作十几年），准备定居泉州的归国华侨，受到石狮蚶江镇大厦村的乡亲们搭拱门欢迎，办桌宴请，闽南“归乡宴”与“古早味”的萝卜饭成为他多年的心灵寄托。这些文化地理场景看了让人吞着口水，却又不失为最传统、最耐人寻味、最朴实、最揪心的画面。看到动情之处，心里不免有点酸楚，家乡的味道，离家的脚步，在此刻使人心里充满矛盾。各个故事场景的主角不光是食物，更是做食物、吃食物的人。



《舌尖上的中国Ⅱ·脚步》如同是一本文化地理的书，包罗天地美食，道尽世间人情，在传道解惑中让观众领略世间繁华，使每一个探寻的脚步都让人们对美食之外的纯粹情感产生深深的共鸣。这哪里是在讲美食啊，简直就是一个个乡土中国的原生态文化地理符号。每个镜头背后都是一个文化地理场景故事的再现。影片中故事场景只是这些马赛克文化区域的一个个点，如果把这八个马赛克式的文化地理场景分布在一幅中国地图上，您会发现从青藏高原到成都平原，从陕甘黄土高原到秦巴山地，从齐鲁大地到江浙沿海，从云贵高原到闽粤沿海……最后连接成为一幅神奇的“人—美食—文化”的分布图。

在这几个故事里，中国大地上各地的普通人为了获得食材，不辞辛苦，艰难跋涉，为了吃更是为了生活，纵使艰辛，也是一种淡淡的清苦与幸福，最后凝结成两个大大的汉字——乡愁。在寻找、制作“食材”过程中，普通人之间情感如同兄弟手足之情血浓于水；父母对子女的舐犊之情，情深似海，恩重如山；乡邻之情充满互助扶持的温暖爱意；赤子之心，日月可鉴。该片折射出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强烈冲击，显示社会发展进程不可逆转的过程。该片不是单纯的美食片，更是中国人的情感大戏。在细碎的片段里，只要看到自家的那碗饭，就会产生苦辣酸甜的共鸣泪水。

我们这一代人得到了很多，也会失去很多。我们在拥抱现代文明的同时，弄丢了各自的“家乡味道”，忽略了给我们做“家乡味道”的人的情感。镜头中呈现的这些地方都是一个个在外游子的“家”，观众在镜头后想念每一片天空和那里的令你朝思暮想的人。无论您离家多远，一日三餐时心中禁不住记忆那一股乡味十足的气息，那一份朴素的五谷杂粮，那一锅幸福美满的美食，那一份牵肠挂肚的情感，还有那满头白发弯腰驼背披星戴月的爹娘。这是一部反映社会变化的影视记录，不变的是乡村味道。

乡村当然不是牧歌，不是田园诗，真正在里面生活的人，不可能像远观者那样写出牧歌的美，他们饱含着生存的艰辛和生命的悲鸣。例如镜头中的泉州萝卜饭：“泉州的大厦村的沙土萝卜着实火了一把。沙土萝卜入口润嫩，毫无纤维感，让人垂涎三尺，却连8分钱一斤的低价都卖不出去。”王情等从中国各类型生态系统的实际食物生产能力出发，通过计算得出中国的食物热量、蛋白质、脂肪分别可以供养人口19.12亿、20.84亿和11.03亿人，热量和蛋白质的供给已经较为充足，而脂肪的供给明显不足。乡土中国最底层民众仍然承受着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都在承受着的苦难。在向工业社会飞奔并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由于种种人为因素或自然因素，山不再绿，水不再清，自然实体的乡村大范围地消失，乡村的文化传统也在逐渐淡去。多年前孩提时候爬树捉鸟、下河抓鱼、回家吃上一海碗母亲做的可口饭菜的故事场景只能通过文字书写、影视记录等得以再现。曾经“依依墟里烟”的乡村，只剩下老弱妇孺的孤独背影。一批批走出乡村的农民和留守在乡村的“386199”部队（38指妇女，61指儿童，99指老人），因为空间的分割，怎能不产生乡愁？他们又能在哪里安放自己的乡愁？我们需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让每个人记得住乡愁，记住对乡村风土人情的保护与传承。荧屏之内的文化地理场景使荧屏之外的观众产生极强烈对比，并涵盖悲剧性的乡愁情怀。

随想录